

彩虹朝聖



邊緣和解

酷兒信仰者的個人故事



編輯: Kerstin Söderblom,
Martin Franke-Coulbeaut,
Misza Czerniak, Pearl Wong



邊緣和解

酷兒信仰者的個人故事

目錄

Olav Fykse Tveit 前言	2
酷攪神學。酷攪聖經文本。Kerstin Söderblom 引言	3
解放身分 – 細閱聖經和自己的生命。Martin Franke-Coulbeaut 引言	6
非洲	
來自加納的 Felicia	8
來自尼日利亞的 Uchenna	10
來自南非的 Ecclesia	12
來自烏干達的 Kasha Jacqueline Nabagesera	14
美洲	
來自巴西的 Ana Ester Pádua Freire	16
來自加拿大的 Noah Brown	18
來自哥倫比亞的 Fabio Meneses	20
來自墨西哥的 All-in Saltillo	22
來自美國的 June Barrett	24
亞洲	
來自中國的 Eros Shaw	26
來自中國的 Joseph Yang	28
來自香港的 Shirley 和 Bell	30
來自香港的 Small Luk	32
來自印度尼西亞的 Arisdo Gonzalez	34
來自印度尼西亞的 Hendrika Mayora	36
來自新加坡的 Pauline	38
來自南韓的 Summer Sea	40
來自台灣的 Chen Xiaoen	42
歐洲	
來自德國的 Ivon	44
來自匈牙利的 Judit	46
來自波蘭的 Uschi	48
來自波蘭的 Ewa Hołuszko	50
來自俄羅斯的 Yael 和 Yana Yanovich	52
來自烏克蘭的 Hanna Medko	54
來自英國的 Christina Beardsley	56
大洋洲	
來自新西蘭的 Tony Franklin-Ross	58
誇宗教故事	
來自德國的 Maximilian Feldhake	60
來自南非的 Muhsin Hendricks	62
Mette Basboll 和 Gabriele Mayer 鳴謝	64

前言

我很感謝這本小冊子，它為普世合一家庭貢獻了重價經驗換來的反省。它收集了世界各地有關LGBTIQ+人士的重要故事。這樣，它豐富了我們對人類多元的理解，和擴闊了我們對人類經驗的視野，而這個正正是教會和宗教組織應更認真地與之產生共鳴的。教會要不斷學習，思考創造的多元究竟向我們作了什麼啟示，和何謂照上主的形象被造。



不少的見證證實了，在與保護人權和LGBTIQ+人士尊嚴的路程上，我們普世教會大家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論我們的神學如何理解身分和性別/態，所有人也應感到安全和受到他/她們家庭、社會和信仰群體的歡迎和接納。很可惜，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況並不是這樣。上幾週在奧斯陸，在一年一度的同志驕傲大遊行前一晚，發生了恐怖槍擊案。不少酷兒也不再感到安全，縱使在如此自由的挪威。只要仇恨和偏執繼續侵犯LGBTIQ+人士的生活，教會不能停下來休息。

透過「邊緣上的使命」，普世合一運動強調使命並不是一些從有權有勢的人向無權無勢的人、從有錢人向窮人、或有特權的向邊緣的人而做的。同樣地，這個「邊緣上的復和」工程，不單強調LGBTIQ+人士與其家人復和的重要性，更突出與社群整體和教會復和，乃為不可或缺的。社會和信仰群體如何與LGBTIQ+人士相處，顯示了他們的同理心和人道關懷的質素。

奧斯陸，2022年7月

Olav Fykse Tveit 主教
挪威國教會總主教

Kerstin
Söderblom

酷攪神學



酷兒們用酷兒的眼睛去閱讀聖經和神學文獻。他們會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去與聖經故事對話，反之亦然。他們做神學時，也是用一顆酷兒的心和酷兒的頭腦，並且不再需要抱有歉意。其實，這是所有人也正在做的事情。做神學是十分個人，和與其語境息息相關的。這是一個被時間和空間局限的事情，也從來不是客觀的。但很奇怪地，當酷兒這樣做神學時，便有莫大問題。傳統神學家和教會指責這種行為，稱他們為偏頗和不正確。

問題的核心：在過往幾百年裡，人們也只聽到男性學者和教授、神父和主教的聲音。他們所述說的，也在圍護一個以男性主導和異性戀本位的釋經和神學論述框架，而他們特別熱衷於教導他人該如何愛和愛誰。

所以今天，聆聽酷兒信徒的聲音是如此重要。他們的聲音沒有多被聆聽。假若你認真地對待酷兒群體的經驗，你便會看到邊緣上的專業知識。當眾人也謂有宗教信仰和酷兒這兩個身分，是不可調和的時候，你可以從這些努力把這兩個所謂不可能同時存在的身分接連起來的人士身上，學到寶貴的一課。

這本小冊子內所匯集的每位作者也見證了：當他們在一個屬靈家庭和酷兒身分之間，努力調和找尋出路時，往往也同時與他們身處的流行文化和宗教脈絡相矛盾。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他們擴闊了心靈和開拓了新的視野。換句話說，當現代的宗教團體，因要建造圍牆維護及抵禦一切與傳統價值貌似有丁點兒不同的人和事，並隨時陷於與生活脫節的困境時，這些見證為宗教團體注入了脫胎換骨的力量。

過往很多年，酷兒團體盡力奪回「酷兒」這一詞。這詞本身是一個罵人話，為了恥笑和歧視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和其他LGBTI+人士。到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酷兒群體成功轉化這個詞彙，並為它賦予有意義的資源。從此，那些不附合為異性戀本位而設的性別類別，或二元對立式性別認同的人士，便可自豪地以「酷兒」一詞自居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小冊子內的作者們，實在是活生生酷兒神學的主角了。他們的見證反映了一群因非異性戀本位性取向，或非二元性別認同人士的日常點滴。他們遭受到嘲諷、蔑視、仇恨、身體上或心理上的暴力或排斥。而對他們作這些的，往往是宗教群體，還手握聖經。有信仰的酷兒們，便活活體現了對神學欺壓源頭的批判性態度，和一個尋找尊重並徹底包容的高度。

這如彩虹般絢爛的見證，向那些所謂理所當然的性/別認同概念提出了質問，並跨越了界限和規範。如一些學者說，他們「酷攪」一下，便開拓了新的人物和神學的視野了。

酷攪聖經文本

酷兒釋經已不再以防禦性地去為性/別認同多元性作辯解，而是假設這是必然的事情了。所有的被造物也是上主的奇妙創造。在聖經研究領域上，辯論的核心已不再是那幾節所謂「反同經文」 ---- 就是傳統上常被引用為反對同性戀的經文（利18:22；利20:13；申23:17；羅1:18-32；林前6:9-10；和提前1:9-10）。寫這些經文的主要原因，是要從古迦南，以及/或者古希臘羅馬背景內特定的宗教信念分別出來，如廟妓、戀童癖，和與已婚男士有同性性接觸。聖經學者並不認為這些經文對二十一世紀的同志生活有任何意義。

聖經的基本信息就是：所有人也是被上主看為獨一無二的上主形象（參考：創1:27）。這個基本信息確定了所有人的尊嚴 ---- 不

論他/她們的出生、膚色、年齡、身體能力、性別認同和性傾向。此外，多元性/別認同的人士，同樣需要遵守在馬可福音12:29，馬太福音22:34-40和路加福音10:25-28中的「雙重愛的誡命」。愛上主的誡命，和愛鄰如己的誡命，並沒有把人區分。反之，每一個人也應愛上主，並尊重他人，同樣地，他們也值得被尊重和認同。

除此之外，酷攪聖經文本的另一重點，就是在聖經故事中，尋找非異性戀本位的痕跡。這樣，非二元的上主形象便開始被發掘出來，同時那些可以用超越異性戀本位，和超越二元性/別身分的聖經人物，也被識別出來。

現在，這個異性戀本位的釋經傳統被暴露出來，並同時展現了其他可行的傳釋聖經方向，不少學者在研究社會政治、歷史，和語言釋經傳統。酷兒學者用文學中的缺口和空白位置，去指出聖經中不同的含義和傳釋。為了囊括酷兒的觀點，我們必須鼓勵看出字裡行間的意思，和推動批評性的重新演說。

再者，酷兒神學研究強調要把恐同和恐跨的維度與其他不公義的維度連繫上，如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反猶主義、殖民主義、年齡歧視和殘疾歧視。這個跨系統的分析，有助我們充分地把在教會和宗教群體內的權力和不公義的架構描繪出來，以至我們理解這些不公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這小冊子內的作者們，藉著他/她們述說自己的酷兒故事，為這複雜的紋理獻上他她們獨特的角度。他/她們的故事看到了懷疑和信念、盼望和恐懼。而這些與其他東西環環相扣，如處於不同洲分、國籍、膚色、文化和社會政治處境，和眾多宗教派系等。倘若讀者們小心地聆聽，你們可學到他們如何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生存，和如何營造一個認同及包容所有人的社會和宗教群體。

Martin Franke-Coulbeaut

解放身分－ 細閱聖經和 自己的生命



在 聖經的日常生活中發掘多元，在脫離個人和群體層面屢被受害，是十分重要的工具。主流社會以二元和異性戀本位為行為準則（即，一個人只可以是女或男，和性只有在與兩個異性個體之間進行才恰當），這無疑是迫使酷兒小眾群體，必須為自己的身分作出有意識的決定。

這小冊子中很多同志的見證也顯示出，他們需要在一個與他/她們信仰群體所確認的信息背道而馳的環境下，建立他/她們的身分：Kasha Jacqueline Nabagasera 談及烏干達那「錯誤地傳釋教義」以至教會把女同性戀者拒諸門外；中國的Eros Shaw和 Joseph Yang則論及他們需要先彩虹團契中互相支持，才能活出他們同志的身分。一個人孤獨地與自己的身分掙扎，是出櫃旅程中其中一個最大的障礙。

雙性戀者如香港的 Bell 和 Shirley及波蘭的 Uschi，比起在一個開放社會中較容易找到一個安全安間的女同性戀及男同性戀來說，他們所遭遇的拒絕往往更甚。而跨性別和雙性人，如印尼巴布亞的Hendrika Mayora，香港的Small和德國的Ivon，他們更需要在一個更少榜樣可循的環境下出櫃或轉換性別。他們的見證可為很多人帶來鼓勵和支持。

新加坡的Pauline談及縱使她面對內外的掙扎，信仰仍可成為在出櫃與和上主和好旅程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在那個黑暗的時期，唯一讓我

可以繼續前進的，就是在我的靈魂深處裡，深知道上主愛我，並且祂認為我是沒有問題的，而我也認為上主沒有問題。每次我向上主呼求時，一種莫名的平安和肯定便湧入我的心和靈魂。」最終，唯一改變了的是「我不再害怕被拒絕到一個地步，我不能說出自己的真實。」

正當我們顯示出出櫃這個旅程，在世界各個文化中也會出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可協助我們接受自己身分的，並不只有基督宗教而已。與其他宗教站在一起，印尼的跨男Amar Alfikar和南非的Imam Muhsin Hendricks分享到他們在伊斯蘭教中的經驗，而來至美國但住在德國的同志拉比 Max Feldhake則描繪他於猶太教的經驗。我們特別感激他們的見證，並確認他們所分享的個人故事，與其他的見證一樣，是很令人鼓舞和充權的。

在這小冊子所收集的故事，並不只有助於同志群體。它們指出了一籃子的方法，可幫助其他小眾，和在自我發現和尋找自尊旅途上不同階段的人士。不境最終，所有人也有成為小眾的一刻，即是在一兩個情況下，他們要承認「我在這個情況下，是與人不同的」。聖經支持這些發展，因為它描繪了在不同時空、語境和文化下，完全不同生活方式。它圍繞著被欺壓和被邊緣化的人，並如Ivon所說，是「通過其重重的對話式結構」，是「反基要主義」的。與其他信仰情況一樣，日常生活和聖經是需要互相傳譯的，並透過此互相傳譯的過程，可在其中成為多元性小眾和身分的豐富資源。

當然，在某些身分認同和性向的人士來說，會認為某些經文較其他經文有價值。但經文中的多元性是從來沒有消失過。在過往最有決定性的聖經版本中，被社會拋棄的人和居於下風的人的生活與盼望的光芒，仍然耀眼，並鼓動人繼續尋找自由、尊嚴和尊重。希望的力量和眾多的上主形象，意味著上主是代表多元的。上主不可能只與異性戀本位的性/別認同一方為盟。

我們衷心感謝所有勇於在這小冊子分享他/她們故事的人。他/她們讓我們看到一個願境的希望，並一個逾越異性戀本位和基要主義常態的復和，而透過這些，他/她們為眾人創造了一個安全的空間。

來自加納的 Felicia



我不曾在外 婆家找到平安

在我的性取向、我的信仰和我與上主的關係方面，我經歷了很大的掙扎。我的主日學老師的教導使我相信同性戀是世界上最大的罪過，而這罪孽除了會帶來譴責外，還有最嚴厲的懲罰。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這個教導在我心中製造了莫大的恐慌，造成了我後來稱之為「人際衝突」。

當我漸漸長大，我發現自己對女生有好感，並被她們深深吸引了。但那將遭到最大懲罰的恐懼，把我迫入困境。我一直感到內疚，靜靜地坐著。每當主日學老師這類的說話突襲我時，我便會處於一個情緒十分不穩的狀態。

不久之後，我便接受了堅信禮，並加入教會的主日崇拜。不過，因為主日學的教導一直纏擾著我，我從沒有參與任何教會活動，甚至沒有領聖餐。與此同時，我越趨被女性吸引，而我對她們的傾慕也日益增加。

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我只好逃避參加每週日的主日崇拜。取而代之，我走到沙灘或靠近我家的海岸角城堡。當我父母

以為我在教會時，其實我在沙灘耐心地等待著崇拜的結束，然而回家與家人重聚。這個狀態維持了好幾年。

後來，我搬到我外婆家中，也參加了她教會的團契。但這所教會卻以前的教會一樣，充滿著仇恨言論和各種譴責。

最後，我也沒有再去教會了，並找了一大堆理由給外婆。我外婆她一直尋求用基督模式去養育她的家人，使他們更加親近神。

生活越來越艱難。我視自己為一個罪人和家中的害群之馬。並因為他們已開始懷疑我的性傾向，我一直孤立自己，與家人保有一段距離。

外婆會帶我去牧師那裡禱告，要求我坐在牧師前好讓他們可以見到我，然後為我驅邪。我接受各種各樣的救助和輔導，卻沒有改變我的感覺。

我唯一需要背誦的禱告，就是求神改變我和救我脫離祂那最大的懲罰。

我不曾在外婆家找到平安，因為外婆一見到我，就會辱罵我和用各種侮辱的說話去羞辱我。住在我家附近的，都聽聞過我的性傾向，因為外婆會把握所有機會，每天早晨用越倍大聲的聲線喝罵我。就連我自己家中，也根本沒有任何人願意與我有任何關連。

我和神的關係也很差：我沒有返教會，不禱告，也無人可以增強我和神的關係。

直到我參加了一些同志機構和團體，這個情況才有點轉機。我從那裡得到了一點兒的力量，而我也希望可以慢慢地改善我的信仰和我與神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很害怕他們可能會再次把那恐懼加諸在我身上，我還沒參加任何教會。但我有計劃要不住禱告，勸讀聖經，並遵從聖經的教導。

來自尼日利亞的 Uchenna



「我不會認為自己的性別是異常或不自然」

我來自一個嚴格的羅馬天主教基督教家庭。從小，我便精通天主教教理。這使我在9歲時，便成為了初領聖餐的候選人，亦在11歲時做了堅振聖事的候選人。在這麼多年投入教會的日子裡，我一直知道自己被男生吸引。我大膽地表達我的感覺，但這並不是毫無代價的。雖然家人和信仰群體也因為我學業的良好表現而接納我，我卻被同儕欺負。

因為我對上主，崇拜禮儀和聖公會儀式的熱愛，我總感受到一種神性的連結。在這些熱愛的驅使下，我加入了祭壇騎士（按：即輔祭或聖壇侍從），以便服侍在禮儀和聖體慶典中。我渴望深入理解聖經，這促使我加入了天主教神恩小組。我一直是，並且仍在努力成為一名基督教牧師。

我不會認為自己的性慾是異常或不自然的。直到我長大後，聽了一篇有關所多瑪和蛾摩拉的講道。牧師在台上強調同性戀者會在地獄裡腐爛。那時，同性戀這個詞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當時感到很困惑，感到十分痛苦。

為了尋求真理和調和這個現況和我的信仰，我放棄了聖公教會，並加入了五旬節教會。我迫切地需要有切實的保證，證明上主是愛我的，並祂對我性取向是肯定的，但我所得到的只有詛咒。即使在短暫就讀高等院校的時候，我仍努力希望扭轉我的性取向，以符合傳統的性倫理觀，所以我曾嘗試與異性交往。但是，我的同性戀傾向仍然很強烈。到了某個時候，我更不得不向我的女朋友出櫃。幸好，她表示理解。

就在尼日利亞簽署《禁止同性婚姻法》的同一年，因我很渴望被肯定和得到某種心靈上聯繫的感覺，我加入了基督教福音音樂事工。這一事態發展（按：禁止同性婚姻立法一事），激發了信仰群體內的反LGBTI運動，而我加入的團體正積極參與其中。可是，由於我對福音歌曲的熱情，我無法離開這個團體，忍受了這群人多年來反對同性戀的祈禱。

但由於我清楚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是自然的，並且無論我做出什麼努力，我也無法改變自己的性取向。因此，我加入了一個致力於促進尼日利亞LGBTI人權的組織。通過各種培訓和研討會，我現已開始了我的自我接納之旅，並志願成為一名同伴教育者。

在與自己和好的旅程中，我發現上主的愛和憐憫在我的生命中永遠足夠。上主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從未因我的性取向而減弱。雖然教會接受這個現實的速度很慢，但我相信隨著更多的對話，最終會有包容和肯定。

來自南非的 Ecclesia



今天，我 已經幸福地 結婚了

在 侍奉上主，和在性取向/性別認同與我的靈性復合的旅程，是十分複雜的。在這旅程中充滿著學習和挫折，但最終卻充滿著希望和愛。

我的信仰對我來說一直很重要。我出生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靈恩派的基督教家庭內。當我得出結論，確認自己是女同性戀的時候，我意識到這個現實不會被我的家人或教會接受，所以我隱藏了這個真相，並曾經嘗試融入異性戀關係。

不久之後，別人發現了我的性取向。他們毫不含糊的告訴我，我是不能同時當一位基督徒和女同性戀者。教會對同性戀的立場，給了我一個明確拒絕的信息，我被迫離開教會。我的痛苦和失落是巨大的。

過了幾年，我和神有個巧遇，讓我回到教會。我知道上主是愛我和接納我的，這讓我重新的跟從上主。在那時，讓我融入社區的唯一方法，便是透過著隱藏身份或

獨身的生活。為了克服被拒絕的恐懼和痛苦，我妥協去參加輔導和支援小組。我也有參加過前同性戀事工，當了幾年的成員。然而，這些努力都沒有改變自己的性取向。為了遵守教會的教導，我一直否認自己的身份。我相信自己上主呼召我到按首授職的事奉中。

在這段自我否認的時期，我偶然發現了衛理公會。在這裡，女性可以被按立，我清楚地看到了我履行上主呼召的道路。在這些年裡，特別是在神學院的時候，通過大量的研究，我發現並接受了更具包容性的釋經。我再次發現沒有任何東西，是可以隔絕神對我的愛和接納。最後，我得到了我的結論，我的罪不在同性戀，而是在拒絕了神創造的我。

透過上主的恩典，我遇見了我的伴侶。在再也無法忍受毀滅靈魂的沉默下，我對教會宣布我想結婚。他們的支持和良好的祝願讓我不知所措。我意識到，因為我是誰而被拒絕的，遠比因為我不是誰而被接受要好。我想和伴侶結婚這願望，最後導致他們終止我在衛理公會 (MCSA) 的事工。我決定把這事件告上法庭。這給我的婚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並導致最後我們做出了結束婚姻的痛苦決定。然而，法院決定將此事發回教會。

我能夠與家人分享我的旅程，這為我們的關係帶來了新的視角和治愈。衛理公會在 2020 年 10 月改變了他們的政策，以完全包容同性伴侶。今天，我已經幸福地結婚了，並領導著一個名為共融與肯定事工 (Inclusive and Affirming Ministries (IAM)) 的組織，這是一個基於信仰的非政府組織，總部位於南非開普敦，成立於 1995 年。

來自烏干達的 Kasha Jacqueline Nabagesera



我將繼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爭取所有人的 平等權利

我的名字是Kasha Jacqueline Nabagesera, 我於1980年4月12日出生於烏干達的坎帕拉。我是家裡的兩位小朋友中較年長的。我是一個自豪的女同性戀和宗教人士，源於新教信仰。縱使我活在一個認為同性戀是非法的國家，而任何被捉到參與該行為的人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我一生仍以女同性戀者的身份公開生活。

在厭倦了被許多學校開除之後，我在大學時代開始了我的行動主義。由於我以女同性戀者身份公開地生活，我在大學的最後一年瀕臨被開除。

公開自己的性取向讓我遇到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情況，包括身體、語言和宗教上的騷擾。由於在教會內的講道宣揚對同性戀的仇恨，我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停止了去教堂。各個教派的宗教領袖在全國傳播如此多的仇恨，這讓我厭惡一切與宗教有關的事情。

因為我意識到這是我行動主義的一個很大的障礙，我不得不調和我的信仰和性取向。逃離壓迫者從來都不是明智的策略。我意識到我需要與宗教領袖接觸，以便他們了解我們並停止誤解教義。烏干達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國家，很多人都遵循宗教領袖所說的一切。要實現我為之奮鬥的自由和平等，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這些年來，我慢慢開始回到教會。雖然返教會的次數仍比我希望的少，但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可以讓我重新回到我的信仰道路上。我們還看到一些宗教領袖，公然地站出來譴責對 LGBT* 群體的歧視。他們要為同性戀站台，也面對極大困難，就像任何其他敢於大聲支持 LGBT* 群體的人一樣。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現在開啟了對 LGBT* 友善的禮拜場所，讓他們可以在這些場所內尋求諮詢，以調和他們的信仰和性取向。我們還開始與一些著名的宗教領袖進行會談，儘管這些會談進展緩慢而且還是秘密的，而這對我們的目的也沒有真正的幫助。

有一個像來自南非前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Tutu)的著名宗教領袖為我們發聲，這無疑為我們的正義事業大大地提高了聲望。因此，如果我們可以在非洲大陸擁有許多像他這樣的人，那將真的很有幫助。我將繼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爭取所有人的平等權利，並爭取充分融入宗教和社會社區。我知道，我並不孤單。這個感覺很好。

來自巴西的 Ana Ester Pádua Freire 博士牧師



如果我們不觸動 人們的心靈和身 體，就沒有任何意 義”——上主詩歌

這是一個文字告白。我在這裡承認我愛上主，愛祂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也愛祂在生命中的啟示。在我的信仰與性慾、身體與慾望和解後，我以女同性戀神職人員和酷兒神學家的身份寫作。

在我決定讀神學之前，我遠離了上主一段很長的時間。只有在一段戀愛關係的痛苦結束後，我才決定回到教堂。但是哪個教堂？因為我的性取向，我被以前的會堂趕了出來。我曾是新五旬宗教會的一員，並活在一個前女同性戀者的謊言中。但是，生活在這個謊言中讓我失去了正堂的神智。真的。我的女同性戀態度從我的每一舉動、每個毛孔中

流露出來。我怎麼能把身體的整全棄於教堂門外？我怎麼能接受被閹割的進入聖殿？我不值得被這樣對待。教會、社區和上主這幾個想法讓我感到非常害怕。但我內心有些東西在想念上主。我渴望上主。

是的，我想念上主，而我必須承認，我想念聖經。我在這個教會的那段時間，在成為一位導師門生並接受他的教導下，與聖經和上主建立了深厚的關係。但是我怎麼能打開這本譴責我的書——這本書讓我遠離了我的信仰群體，遠離了我深愛的牧師，遠離了為主獻身事奉的夢想？我怎麼能花時間閱讀有關譴責、永恆的死亡和世界末日的書籍，而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找到情感和接納？

在此期間，為了保持心智健全，我沒有閱讀聖經文本。但最終我竟發現了其他神聖文本。這些文本對我和我全人來說都是神聖的。這些文本向我揭示了上主。魯貝姆·阿爾維斯 (Rubem Alves) 以他的睿智說：「有一段時間了，每每要思考上主時，我沒有選擇閱讀神學家的書籍，但我選擇閱讀詩人。」詩詞拯救了我！每次我讀到一些詩歌時，就好像我遇到了耶穌的福音一樣——全都是在敘述一種壓倒一切的愛。思念使人做出這些事情：它讓人把沒有的東西，活現在最簡單的事物中——親吻臉龐的風，不怕綻放的花朵，使人不再焦慮的詩歌。在往後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每當我開口論述上主時，我說的是「思念」、是「渴望」，但我也學會了說「詩詞」。

巴西詩人科拉·科拉利納 (Cora Coralina) 說：「我不知道生命對我們來說，是太短還是太長，但我知道，如果我們不能觸動人們的心，那麼我們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我敢於補充，如果我們不能接觸人們的身體，我們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調和信仰與慾望時，只有透過那觸摸，那個承認對方的身體就是他/她的道成肉身的觸摸，才能顯露出神的神聖同在。

ANA ESTER PÁDUA FREIRE 博士牧師

17

來自加拿大的 Noah Brown



「我與去教堂的人分享了令人大開眼界的對話」——掛毯藝術作為和解的橋樑

2017年夏天，我開始創作大量作品，解構我在青春期作為一個酷兒黑人的經歷。那時，我剛剛意識到自己是酷兒，而代際創傷的負擔不斷出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那年年初，我在公共汽車上時，有兩個黑人男孩對我大喊恐同言論，並恥笑我的每一個特徵。在這個經驗中，最困擾我的地方是他們看起來與我無異。我無法理解，縱然我們有著相同的歷史背景，但他們卻竟可以以這些傷人的誹謗，去公開地羞辱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人。當時，我還沒有接受自己的性取向。現在回想起來，我現在意識到他們可能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連我自己都不了解的東西。

我從這次經歷中壓抑了很多憤怒，所以我選擇將這些情緒集中在我的藝術上。該藝術集包括一系列掛毯、瓷器雕塑、工業設計產品和攝影作品。以1.2 x 4.8 米掛毯複製布魯克斯奴隸船模型，是我完成此藝術集的最大障礙。我計劃在我的學校以針刺製氈的方式製作整個掛毯，但學校大樓卻因維修問題而關閉了。

我需要一個大的創作空間。我媽媽遇到了多倫多的龍塞斯瓦耶斯聯合教堂(Roncesvalles United Church)。Anne Hines牧師細心聆聽後，張開雙臂歡迎我加入她的群體。她帶我去了教堂的地下室。房間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一個兒童劇院，地板上的標記似乎是老式體育館的遺跡。這是完美的工作室空間。

在我逗留期間，我與去教堂的人分享了令人大開眼界的對話。我注意到教堂設有幾個項目，如康復中心、全球醫學慈善機構和施粥所——這些項目都影響了我所在的社區及其毗鄰地方。我在這個空間感覺很安全，我開始與教會群體建立一種特殊的關係。一天，海因斯牧師來教堂地下室拜訪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在下次禮拜中發言。一想到要分享我的過程並談論我的旅程，我就興奮不已。

到了這一天，主日崇拜開始時，社區成員拿著我的掛毯，沿著教堂走道緩緩地進入教堂，並把掛毯展示在坐著的信徒面前。海因斯牧師很熱心地介紹了我的工作，以及為什麼我創作的藝術對教會很重要。然後，我與一群專心並以白人為主的會眾交談。他們表示好奇，並就我作為一個酷兒黑人的經歷提出了一些問題。這個經驗為我們帶來了理解、謙遜和一個質疑自己過去行為的意願。

這次經歷中最難忘的時刻，是我在崇拜聚會後與會眾中較年長的酷兒成員的討論。我們談到了他們的如何接受自己的身份，和他們在恐同環境中成長的磨難。這些討論幫助我了解了我自己的創傷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如何不斷地重複著。

NOAH BROWN

19

來自哥倫比亞的 Fabio Meneses



「教會並沒有治愈我的同性戀」

我於 1980 年出生在波哥大。現在，我在一家公共圖書館工作，擔任閱讀推廣員。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是和家人一起在哥倫比亞著名的五旬節教會度過的，後來我參加了其他新五旬節教會。從我能獨立思考的那一刻起，我便喜歡男人了。但因為在那些教堂裡，我被教導同性戀是一種可怕的罪惡，所以多年來我一直壓抑自己的性取向，並試圖改變它。顯然，我沒有成功。

為了實現這種改變，我遵循了每一個承諾可治愈我同性戀的教義。這些教義包括傳統的屬靈操練，如禁食、祈禱和背誦聖經經文，以及各種偽科學療法。

此外，我是一個基督教支援小組的成員（基於美國「前同性戀」事工的方法）。在那裡，我們被教導我們必須學會與同性吸引共處，就好像與其他疾病共處般。他們教導我們，我們永遠不會停止自己被男人吸引這事實，但我們必須學會控制它。有一次，我與小組中的一名參與者發生了性關係，我因此被免職。他們要求我在其他領袖面前公開道歉。這種公開羞辱的經歷是促使我離開小組的原因。

儘管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努力，但仍然沒有結果，這讓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內疚感、悲傷、痛苦，並包括自殺的念頭。我本可以像電影《為鮑比祈禱》(Prayers for Bobby) 中的主角那樣結束自己的生命，但由於上主的干預，我找到了另一種從我生活風暴中走出來的方法。2013 年 10 月某天，當天我正在工作時，33 歲的我毅然決定接受不可否認的事實，我承認自己是同性戀。2014 年 8 月，我在面書上與家人、朋友和其他認識我的人分享了一篇文章，公開出櫃，並(把我在網上出櫃此事)告訴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不能接受我的出櫃。他們一直知道我在試圖改變，並把我的出櫃視為投降。到目前為止，他們仍然不接受我的性取向。

出櫃後，我決定不回教堂了，我不想繼續留在一個譴責我的機構裡。但兩年後，我覺得有必要與其他人聚在一起。我尋找一個包容性的教會。起初，我找不到，但後來我找到了一個為 LGBTI 而設的跨宗教團體，並參加了。在那裡，我遇到了我的伴侶，他邀請我去波哥大的哥倫比亞衛理公會教堂，該教堂正在接納不同性別/取向的信徒。後來，我的伴侶 Jhon Botía Miranda 被任命為教會的牧師。現在，他仍在擔任那個職位，而我則是該教會的一名執事。

今天，我可以毫無疑問及毫無恐懼地說，我很高興我是一名同性戀者和一名基督徒。上主沒有譴責他的 LGBTI 孩子，而且，我相信那些決定以不同的性和性別身份接受自己為基督徒的人，會同樣地體驗到上主賜給我的自由和快樂。

來自墨西哥的 All-in Saltillo



代表 ALL-IN SALTILLO 社區的故事

I te Inflammate Omnia 是墨西哥北部的年輕 LGBT+ 天主教徒社區 All-in Saltillo 的口號。它的意思是「去為每個人和一切帶來光明」（按：去使這世界燃燒起來）。我們採用耶穌會的這句話，它不是一句為了強加於人的戰爭吶喊，而是為了合一的上主情歌。

我們發現年輕人更容易相信諸如「上主不喜歡同性戀」之類的想法。在上主無限的愛和良善的啟發下，我們看到了創建一個反駁這些想法的社區的機會。

逐漸地，該小組開始在「信仰、社區、創建和服務」的支柱下，與代表 LGBT+ 社區不同字母的人一起成長。我必須要指出，在我們小組中，每個成員的個人身份（按：即哪個字母）並不是最重要的；在我們來說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上主所愛的人類，因此每個有興趣進入此群體的人都會受到歡迎。就這樣，我們打開了一扇被排斥和無知關閉了的門。

事實上，我們終於明白上主的愛是永無止境的。在上主的愛中，我們首先作為一個社區團結起來，然後我們加入了墨西哥的 Red Católica Arcoiris（天主教彩虹網絡），我們是最新加入的成員。我們參加天主教彌撒、會議和訓練，在其中活出上主的愛。

在我們的聚會中，有一個禱告的時刻，感謝上主賜給我們的祝福，讓我們證明我們的性取向和我們的宗教並沒有衝突。我們也有一個我們稱之為「分享生活」的時間，讓我們可暢談身遇到的問題和感受。在這些時刻中，我們感覺到上主的同在，祂與我們分享歡笑和淚水並反饋給我們，這真是太神奇了。

就這樣，All-in 成了一家人，但事情還沒有結束。我們將繼續努力讓那些因錯誤言論而與教會分離的人，讓他們看到上主愛我們所有人，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無論是高是矮，無論是胖是瘦，是異性還是同性戀，並努力復興聖經約翰福音中的一句說話：「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會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我已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讓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讓你們的喜樂得以滿足。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是我的命令。」（約翰福音 15:9-12；和合本修定本）。世界不需要更多的暴力、仇恨、排斥和分裂。它需要愛。如果我們可以為重振對上主之愛的信心作出貢獻，我們便應該這樣做，並用上主的愛來照亮所有人。

來自美國的 June Barrett



基督徒、 酷兒和移民

我是一名 57 歲的同性戀牙買加移民，也是一名推動勞工權利的社會活躍分子，現居於美國。

我的母親在我出生後不久就去世了。撫養我長大的姑姑，她雖然自己不去教堂，但她確保我有。作為一個小女孩，我愛上了我的浸信會教堂。在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愛這個詞，一個我在家裡從未聽過的詞語。教會成了我的磐石；當我害怕時，讚美詩給了我平靜。

十幾歲的時候，我知道我被同性所吸引，但我保持沉默。我害怕我將不得不離開教會並成為棄兒。

我沒有人可以求助，因為同性戀在牙買加是一種禁忌。有時我無意中聽到村裡的女人在閒聊，誰是雞奸者或同性戀，並論及他們都會下地獄。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向我教會的一位長老尋求諮詢。我告訴她我的性取向，她告訴我應該為我的從罪中回轉悔改。有一次，他們為我祈禱。那時我躺在教堂的地板上，他們便試圖把同性戀惡魔從我身上

趕出去。我感到十分受傷害，很困惑，並開始有一種孤立的感覺。

我繼續每週去教堂，並參與婦女小組和查經。後來，我與一位教會姐妹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我愛上了她。當我最後告訴她時，她便告之我，我對她的感覺是不正常的。雖然她並沒有停止和我做朋友，但她不斷地提醒我，我是會下地獄的。後來，因為有傳言說我和她是戀人的關係，我終於不再去教堂了。

1994 年 10 月，一線希望出現了。Bärbel Wartenburg-Potter 博士邀請我參加在德國巴特波爾舉行的國際女同性戀會議。在那裡，我遇到了其他女同性戀基督徒。我甚至不知道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個酷兒和牧師！我的生命永遠改變了。我們還去了格爾恩豪森，在那裡我們進一步分享了我們的經驗，建立了聯盟，並製定了回國後相互支持的策略。在感到自己被賦予了權力後，我回到牙買加。我在巴特波爾遇到的許多女性，她們給我的來信讓我保持了多年的理智和聯繫。

1998 年，牙買加女同性戀、所有性和男同性戀論壇 (J-FLAG) 成立了。因為我們沒有安全網，我們歡迎 J-FLAG。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可以幫助保護我們人權的組織。

2001 年，我向一位朋友出櫃了，她也答應了不會把我的秘密洩露出去。但她竟然在我的工作場所把我出櫃了！我不得不離開牙買加，並於 2001 年 12 月 21 日抵達美國。住在這裡有很多挑戰——這兒的恐同症、恐跨性別和種族主義也十分猖獗——但我覺得比在牙買加更安全。我現在是一個歡迎所有人的浸信會教堂的成員。

作為一名勞工組織者，我總是帶著我的移民、酷兒和基督徒的身份的，因為我無法將自己與任何一個身份分開。我經常告訴年輕的酷兒基督徒，兩者兼而有之是可以的，並囑咐他們不要相信那些關於「上主不能接受酷兒」或「你是被魔鬼附身」的虛假敘述。

JUNE BARRETT

25

來自中國的 Eros Shaw



「什麼時候 教會才真正 擁抱這些年 輕人？」

高 中13歲時，我第一次愛上了一個男人。後來我在2009年搬到北京工作，並參加了由歐陽文風牧師組織的分享會。他是在美國大都會社區教會(MCC)按立的牧師，並在中國同性戀基督徒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分享會結束後，來自不同教派的同性戀基督徒聚集在酒吧。那天，我是唯一一位的天主教徒。

我們決定將我們的小組命名為中國彩虹見證團契 China Rainbow Witness Fellowship (CRWF)，因為彩虹是上主與人類立約的標誌，也是同性戀驕傲的標誌之一。我們分享的內容廣泛，從聖經、神學、普世主義和教會歷史到心理發展和愛

滋病預防。2013年7月，神學院學生小北弟兄成立了一個QQ聊天群，以聚集同性戀天主教徒，名為中國天主教彩虹社區 China Catholic Rainbow Community (CCRC)。

在此期間，我邀請了我最好的朋友參加了一個團契辦的聖誕晚會。當他們提到「同性戀」一詞時，她竟大聲喊道：「你不可能是同性戀。」這深深地傷害了我。我們之後很久也沒有談論這個話題，但她偶爾會找文章給我看，希望我能改變我的性取向。但她繼續參與團契，並慢慢地接受了這些同性戀基督徒，包括我的男朋友，甚至認為我們的關係是令人羨慕的。也許她是我出櫃故事中最有意義的人。她是一個直人，在她親自接觸過這樣的一群人之前，她無法理解我們。

有一年，在上海團契舉行的聖誕節慶祝活動的照片，竟被(天主教)教會中的一個批評團體廣泛傳播。他們以極端的方式攻擊我們。為了停止爭執，我們離開了該教區。於是，中國天主教會首次大規模接待同性戀基督徒的活動，僅僅四個月就結束了。

CCRC 的繼續存在是一種安慰。我們也有慕道班和念珠祈禱小組，讓困惑的同性戀天主教徒可分享他們的經歷。更有少數的神父、修生和修女不怕壓迫，自願留在這個社區。

我代表 CRWF 和 CCRC 參加了 2015 年，在羅馬舉行的全球彩虹天主教徒網絡 (GNRC) 的成立大會。我被選為青年事務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我們與梵蒂岡官員進行對話，並將中國同性戀天主教徒的信息傳遞給全世界。我深被那些熱愛聖母的同性戀天主教徒的信仰所感動。究竟我們的聖母教會真正擁抱這些年輕人的一天，將何時到來？我很感激，有機會編輯了《願你的嘴唇親吻我——中國同志 (LGBT+) 天主教徒故事》一書。我得到了很多積極的反饋。我希望教會有朝一日能完全接受同性戀：即使一再受挫，我們也不會停止我們的使命。

EROS SHAW

27

來自中國的 Joseph Yang



「上主對 我的呼召，祂的 使命：支持與性 取向掙扎的同性 戀基督徒」

我在中國福建省廈門市，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長大，這個家庭遵循長老會的傳統。1998年，我在一家名為廈門尋思頂教會的家庭教會受洗。在那裡，小小的我曾與祖父一起學習聖經。當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我的父母把我獻給了上主。有一天，我不小心從父親的懷裡掉了下來，昏倒了。父母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他們懇求神，並答應如果我能活下來，就把我奉獻給神。對此，我父親一直對我保密，直到我母親在2002年因交通事故去世後，才告訴我這個秘密。

職業高中畢業後，我在中國銀行工作。然而，我的生活只能用舒適但缺乏激情來形容。我收到了上主的一個信號，呼召我進入全時間教會事工。當我在新加坡亞洲神學中心（TCA）學習神學時，我還沒出櫃。就在那一年，來至馬來西亞的華人同性戀牧師歐陽文風牧師公開出櫃，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漸漸地，我學會了擁抱自己和我的性取向。

我在新加坡和香港讀了七年神學；正是在崇基神學院，我開始研究中國基督教同性戀群體所面臨的挑戰。畢業後，我開始擔任全職無薪牧師，並在中國大陸為一個性少數群體服務了八年。

2010年，我在互聯網上推出了第一個QQ（中國流行的實時聊天社交媒體平台）在線聊天群（現稱為CTK公共聊天群）。到2011年底，已有400多人加入該小組。我感到再次被呼召，需要繼續並擴大我的事工，幫助那些在性取向問題上苦苦掙扎的中國基督徒。

2012年對我來說是一個里程碑。我和廈門的一些同性戀基督徒一起，協力成立了廈門CTK團契，這是中國第一個由同性戀牧師領導的團契。是時候與其他同性戀基督徒站在一起，互相鼓勵和肯定了。我還通過專門為中國LGBT基督徒而設的在線論壇，積極參與在線祈禱網絡、對話和討論。

2019年，我向上主祈禱，讓我準備好可以在我的休假期間結束後，為內地的同性戀基督徒服務而接受更深入的培訓。我給自己設定了以下三個目標：第一，我希望從福音派的角度，探討對LGBT基督徒的事工這個議題；其次，我希望在植堂和關係事工方面進行深入研究，以便更有效地服侍在中國的LGBT基督徒；最後，我會繼續探索酷兒神學，拓寬我對未來中國大陸神學教育的精神視野。

接受我的性取向並不容易。一切超出我的想像，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將繼續展望上主對我的呼召，祂的使命：支持與性取向掙扎的中國同性戀基督徒。

來自香港的 Shirley 和 Bell



真理會讓你 自由！

「如果你不是女人，我不會愛你；
但因為你是女人，我不能愛你。」

我們是一對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女性雙性戀伴侶，香港是一個半西方化和高度父權化的中國城市。我們的故事開始於 25 年前的一個女性宿舍，在那裡，性是禁忌、性取向是聞所未聞的，而同性關係也不被贊同的。我們第一次約會的兩個月後，我屈服於巨大的社會和宗教壓力，結束了這段關係。十一年過去了，我們在一次為慶祝宿舍而舉行的音樂會上再次相遇。在那個小房間裡，看到她在舞台上彈鋼琴，我突然覺得好像有兩盞聚光燈照在我和她兩人身上。我再也騙不了自己，並了以上兩句句子贈給她。幸好有我遲來的誠實和她的膽量，我們被腰截的愛情便復活了。

我們很快了解到，原來我們嘗試找安全的 LGBT 保守基督教教會內，雙性戀被貼上了「濫交」的標籤。所以我們退回到一個「較安全」的

30

來自香港的

身份——一對女同性戀伴侶，並扮演了預期中的 butch 和 femme 角色。但這不是我們的本相，並且與我們對平等關係的渴望相矛盾。這種性別角色扮演的根源在於不安全感、恐懼和自我懷疑，而這些特質只會播下自我延續和自我實現的種子，從而窒息及扼殺一段關係。對於那些面對一連串問題的同志伴侶，如需與家庭打交道，或被大多數教會對他們投擲詛咒的同志伴侶們，他們在沒有榜樣或專業機構可以尋求建議的情況下，這可能是一場難以逾越的艱苦戰鬥。幸運的是，我們遇到了一些同志友好的顧問，經過幾年的輔導諮詢後，我們終可解開真實的自我。

雙性戀伴侶的生活是雙重挑戰，原來擺脫性別角色不足以活出真正的自我。雖然我們接受了其他人的種種關係，但我們對自己的關係，卻保持著一個不同的，更「道德」的「標準」。這種內在的虛偽和這「突然」認識我們的真實性取向，使我們都陷入了更深的自我仇恨。經過一段時間的內部掙扎，我們鼓起足夠的勇氣，向對方相互敞開心扉，竟發現原來我們一直在為同一個問題而掙扎。通過這種和解，我們走出了抑鬱，並建立了一個更牢固和更紮實的關係。

正是在這裡，我們探索、試驗和體驗我們自己的性取向、身份、期望和愛的超越力量。在我們 25 年的相識和 13 年的忠誠關係的日子中，我們與我們的信仰、婚姻觀念、保守但充滿愛的家庭以及同性戀主導的信仰社區打了激烈的仗。現在，我們以雙性戀/泛性戀基督徒伴侶的身份結婚了。生活繼續充滿挑戰：生命只能從回顧中領悟，但必須在前瞻中展開。當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時，我們要選擇真實、誠實和真理。只有這樣的選擇，才可讓我們親身體驗耶穌的教導：「真理會讓你自由」。

SHIRLEY 和 BELL

31

來自香港的 Small Luk

「你照顧 我的雙性 人孩子！」



我是細細，一個出生在香港的雙性人，並以第一個公開承認雙性身份的香港本地人而聞名。當我被醫生稱為「性別不明」的嬰兒出生時，他們確定我是個患有生殖器疾病的男性。我的家人定斷我的性別，也是因為我是我家中的第一名孩子，而男性對中國家庭來說非常重要。

從八歲到十三歲，我接受了二十多次生殖器重建手術。這是我童年的痛苦經歷。我在十三歲時，拒絕再進行任何手術；隨後他們在我體內發現了子宮和陰道，但發育不全。然而，在醫生的建議下，為了避免患癌症的風險，我決定切除所有的男性部位，這又是一次困難的手術。現在我以女性雙性人的身份生活。

我在住院期間接受了耶穌。經歷了生殖器手術後，我感到非常痛苦、悲傷和無助。有一位牧師在病房的床邊和我一起祈禱，並給了我一本聖經。每當晚上我被劇烈的疼痛驚醒時，我都會閱讀新約聖經。我發現耶穌是一位偉大的主。他為救贖我們而獻出了生命，讓我們有機會去天堂。我向耶穌祈禱，把我的生命獻給他。

2010年，我完成了切除所有男性部位的手術，並在日本時聽到了上主的聲音。當我看到盛開的櫻花時，那個聲音說：「這裡有一朵花開始開花了，我需要有人開始我的工作。」上主說：「你照顧我的孩子。」我問上主，這些孩子是誰。祂回答說：「我的雙性人孩子。」起初，我拒絕了上主的呼召，一想到如果人們知道我是雙性人就會失去一切時，我感到十分害怕！2011年3月的一個清晨，在我聽到神的聲音一年後，我再次聽到了呼召，並在夢中聽到了雙性人嬰兒的哭聲。就是現在，生殖器重建手術仍繼續在雙性兒童身上進行。對於這個情況，我感到難過萬分。我爬上最高的山來確認上主的呼召。我對上主說：「在陰天給我一個非常美麗的日落景色，以此為證！」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到達山頂時，我真的看到了一個非常美麗的日落。我跪下來禱告道：「是的，上主，我在這裡，請用我來完成祢的工作！」

在香港和亞洲，為雙性人開展的倡議工作取得了進展。印度和台灣已禁止對 12 歲以下的雙性人進行生殖器重建手術。社會和政府更加了解雙性人的需求。我仍然努力提高公眾意識，促進雙性人權利並倡導結束強迫生殖器手術。然而，一些保守的基督教團體，仍然說雙性人是人類犯罪的結果。

要實現上主保護雙性人權利的工作，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需要你的祈禱和祝福。

來自印度 尼西亞的 Arisdo Gonzalez



「看看 你自己， 上主就在你裡 面。」——我的朝 聖之旅

我的朝聖之旅，是我作為人所經歷的一個過程。這過程是從小學開始的。那時候，我對一個男孩的微笑特別感興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只知道每次上學也想見到他。初中時，我總是盯著一個男生，後來他成為了我最好的朋友。高中時，我受到了諸如「娘娘腔」，「基佬」之類的語言暴力。當時的世界彷彿是黑色的。我幾乎一個朋友也沒有。

在高中的最後一年，我決定把這個情況告訴我的老師。她篤信宗教。在我告訴她我喜歡男人後，她建議我到鎮上的一個大教堂。在那裡我找到了牧師，並告訴他我對男人感興趣。他先把一些論及同性戀關係的聖經經文給我看，然後他用油膏了我，並試圖驅趕我心中的邪靈。那天我感覺痊癒了，但第二天一切卻恢復原狀。我還是對男人感興趣。

高中畢業後，我決定就讀雅加達神學院（JTS）。在那裡，我開始明白神學和人類思想是如何建構的。這一切從我遇到一位 JTS 講師開始。許多朋友稱他為 LGBTQI+ 先知。

在神學院裡，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校園活動。因此，我選擇了 2016 年的 LGBTQI+ 國際會議。我很害怕，但我更想了解 LGBTQI+，而同時我仍然否認自己是同性戀。

在會議上，我遇到了一位同志牧師，並與他傾談了一會。他對我說：「看看你自己，上主就在你裡面。」

我把 JTS 圖書館裡所有關於性和酷兒的書籍也借了下來，並學到了很多新東西。一直以來我所理解的上主是男性的，但現在我知道上主可以存在於人類每一個經歷當中。上主也是酷兒。

一年後，我被安排到一個關懷愛滋病的組織做實習工作。我發現大多數在那裡工作的人都是同性戀者。起初時，我感到不安，因為我深知自己其實是他們的一分子。在我的訪談中，我發現我與他們在宗教上的掙扎非常相似。後來我認識了 Paul，他教了我很多關於同性戀的知識。在他的幫助下，我感到從所未有的安慰。我愛他。

當我向朋友出櫃時，許多人都感到震驚，並認為我被誤導了。我則告訴他們，我依然是 Arisdo，而我喜歡男人。我相信這並沒有錯。

我出櫃容易嗎？當然不是！我有感到很沮喪，並認為我所做的事情都是錯誤的時候，甚至有一次，我嘗試自殺。

通過宗教、性和酷兒神學這課程，我更了解自己的身份。我開始學會批判性思考，並變得更有信心地表明我是一位男同志。

來自印度 尼西亞的 Hendrika Mayora

錯位



我以 Hendrik Victor 的身份，出生在巴布亞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家庭裡。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把大部分的空間時間花在教會活動上。我很渴望像耶穌一樣，時刻幫助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當我還只是一名孩子的時候，我立志成為一名牧師。我的家人完全支持我的志願，並同意把我送到初級神學院。

2012 年，我被按立為日惹一所高等神學院的修士。當我向我的上司坦白承認，我認為自己是一名女性的時候，便受到了懲罰。我不得不離開修道院，並宣誓在清貧中，過著真正的獨身生活。

我經常像著魔了一樣地尖叫，呼喚Hendrick這名男性回到我的生命中，但他沒有回來。我便開始流離失所。

離開修道院後，我嘗試建立新的生活。我曾在西巴布亞的馬老奇，活躍於預防愛滋病的活動。我可以以工作服務有需要的人。我還成為年輕人的導師和健康顧問，教導他們如何避免愛滋病。

正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向自己坦白：「是的，Hendrick，你是個女人。」至此以後，我幾乎每晚都和朋友一起，我感到十分快樂和充滿樂趣。

漸漸地，那個在與自己真實身份掙扎時的暈眩，便慢慢消失了。

2017年底，我決定離開馬老奇，到另一個城市開始新生活。但我該到哪裡去？我最終去了日惹，並在一所孤兒院內工作。

有一天，我參加了一場關於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的培訓，並遇到了以前在日惹見過的女跨性別組織負責人媽媽 Rully。在會議結束後，我懇求她給予我援助，讓我住在她家中。她答應了。她的房子很小，但我覺得我在那裡找到了一個真正的家。我和她分享了很多東西，問了很多關於自身性別認同的問題。然後我請媽媽 Rully 把我打扮得像她一樣。那天，我改名為 Hendrika Victoria Mayora。

起初，我曾因黝黑的膚色而遭到同事的種族歧視待遇。這傷透了我的心。可是，我並沒有放棄。我嘗試透過協助他們處理日常所碰到的問題，來獲得她們的認可。漸漸地，我便在日惹跨性別社區中贏得了他們的尊重和地位。

在朋友的建議下，我成立了一個社區，名叫「錫卡的黎明」，目的是為了收容女跨性別朋友。社區的成員是來自弗洛雷斯島整個東部地區的女跨性別人士。

最近，我在弗洛雷斯省的地區人民協商會議的選舉中獲勝，取得一席位。這是第一次，有跨性別人士於印度尼西亞的選舉中獲勝。

來自新加坡的
Pauline

「為什麼 即使我禱 告，上主依 然沒有改 變我」——邊緣上的 的和解



我是自由社區教會(Free Community Church)的執行傳道人之一。這是新加坡唯一一個前進和包容的基督教會。我是在衛理公會中長大的。

「你是一名基督徒和女同性戀者？」當我以「是」回答這個問題時，有些人回以懷疑的眼神，有些則回以敬畏和難以置信的目光。有時候，我還會以閃閃發亮的眼睛，愉快地加一句：「而且我也是一名傳道人。」

我是很多東西，恰巧我也是同性戀。成為同性戀不是我的選擇（誰會故意為自己和家人選擇如此艱難的道路？），而我很早就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人生中的一個階段。

我確實選擇了成為一名基督徒。在我來說，上主和靈性是很重要的，我從 13 歲起，便是一名基督徒。眾所周知，我是一名擁有“傑出的背景”的福音派基督徒。我年少時曾懷疑並逃避上主，在 19 歲那年，我與上主經歷了一個改變生命的相遇。至那一刻起，我告訴自己，我要認真地對待我的靈性生活，並積極地參與大學的一個基督教團體。其後，我在日本做了四年的傳教士，並同時就讀於一所保守的聖經學院。

在那段日子裡，我仍然是個同性戀者。我不明白為什麼縱使我祈禱、禁食和祈求上主改變我，上主依然沒有改變我。我與家人關係很好，尤其是媽媽，除了性取向之外，我與他們無所不談。如果他們知道我是名女同性戀者，必然會傷透他們的心，所以我只能獨自與我的信仰和我的性向搏鬥。這兩者也是我生活中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我同時有個信念，認為這兩樣東西是無法調的。這真的幾乎要了我的命。

當我嘗試從一次分手的經歷復原時，事情終於到了一個臨界點。我很痛苦，但因為當時我未曾與我的朋友出櫃，我身邊竟然沒有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我只能向上主傾訴。在那個黑暗的時期，唯一讓我可以繼續前進的，就是在我的靈魂深處裡，深知道上主愛我，並且祂認為我是沒有問題的，而我也認為上主沒有問題。每次我向上主呼求時，一種莫名的平安和肯定便湧入我的心和靈魂。這份平安幫助我邁出了接受自己的第一步。在我開始讀全日制神學時，我驚訝自己對聖經和神學知識之貧乏。我開始研究這類經文的真實翻譯和歷史背景，這讓我更加確信，上主接納並照我本相地愛我。

當我終於有勇氣向父母出櫃時，他們覺得十分為難，媽媽甚至哭了。這已是近 20 年前的事情了。縱使如此，我覺得出櫃後，我與家人的關係變得更好了。

我分享我的故事，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人。我想對那些正在掙扎並想知道上主是否接受並愛他人說：「上主正在等待他們回家。」

PAULINE

39

來自南韓的 Summer Sea



「現今我 決定不再 拋棄自己的任何 一部份」

現今，我仍然在一條不清楚自己的性別認同的路上。在構建我身分的過程中，要解開那千絲萬縷組成我的關連，實在不容易。除了怪罪於我的原生家庭和信仰群，使我一生也要過著要壓抑著最自然的身體和情緒表達外，我看不見其他方法。我想在這兒寫下：我不是你想要的冒牌，你的說話是錯的。

我於1999年在南韓首爾，出生於一個十分虔誠和保守的基督教家庭裡。我爸爸厭惡同性戀一字，而我媽媽則告訴我不要說任何「邪惡」的事情 ---- 她指的是同性伴侶。我媽媽一生活在一個嚴苛和苦行的信仰中，而我的性傾向便成了我倆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議題。

從小，我的所有情緒和慾望，也以上主之名而被控制。舉例說，我只要愛其他人，無論男女，同性異性，也會被形容為被「奸淫之靈」附著。我記得第一次愛上一位同性時，我只有13歲。之後，我愛上了另外四人，但其他我曾被吸引過或有情慾感覺的，則未能盡數。

現在想起來，我想媽媽很早已知道我的性取向是不「正常」的，但我一直把這些經驗視作個別事件和較不真實，並嘗試過一個異性戀生活。媽媽應該是在嘗試保護我，但我仍想像回到從前並與那時的媽媽對話。我會對她說：「我不是因為讀了什麼有關同性戀的小說，而被它啟發了才喜歡我的朋友的。」或者，「不是附在我身上的靈體喜歡了她們，其實是我喜歡了她們。」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然的跟她談論這些事情。也許有一天吧。

現在我和家人分開了，但我並不是過著與被遺棄過去完全切割的生活。現在，我鬆散地標籤自己為雙性戀或性別酷兒，並與我關心的人一起，加入了一個安全的群體，一起參與基督教酷兒運動和其他社會小眾運動。我有時也仍感到困惑、焦慮、和被傷害，但同時我又可以活於此刻喜樂、自由和寶貴的當下。我在尋找一個更廣更闊的上主，一個有別於我媽媽那傷害我的上主。

這個酷兒群體帶給我的安慰就是，它容讓我確認這刻的我，正處於一個混淆但同時毫無模稜兩可的狀態。這個是因為我容讓自己被教導，去學習這一點：原來我未能找到一個答案或把一切也弄清楚整理好，是沒有問題的。現今我決定，不再拋棄自己的任何一個部分。就是它有點兒重並困難，我仍決定擔起我存在所累積的包袱。我希望我們所背負的是好的。我也盼望，我們生存的世界會為你為我而變好一點。

來自台灣的 Chen Xiaoen



復和始於邊緣： 因為同志身份， 我成為一個更 好的人。

出生於1980年的我，成長在一個虔誠的基督福音派家庭，並且活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從小我就抓緊上主：不是因為我的基督徒成長經歷，也不是因為我幾乎完全以教會為基礎的青少年期；相反，是因為我从小就感覺自己跟別人好像不大一樣和那份孤獨，使我更加接近上主。

同樣地，即便在我第一次戀愛之前，我對待關係問題的認真並非出於虔誠。相反，正是因為知道教會或其他基督徒不會接受同性關係，這促使更加認真的思考各種關係——什麼是喜歡？什麼是愛？什麼是朋友？什麼是愛人？兩個人委身彼此在一起的意思是什麼？怎樣的關係與經營可以稱對方為伴侶？婚姻又是什麼？在法律上跟在信仰裡有不同之處嗎？

即便是唸神學院及接受牧養呼召，一開始也是如此：不是因為對聖經研究有天份、或在信仰上有過人追尋，所以喜歡神學、想更多研究，而是因為我覺得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上主對像我這樣的性少數群體和我們社區的呼召。上帝的心意是什麼？還有不同時代裡的人怎麼理解與回應信仰？怎麼認識上帝與回應上帝對個人及群體的呼召？

主流教會教牧指導的缺乏，促使我裝備自己，扮演與他人同行在上主的同在中並經歷不同的人生階段的角色。

這些多年的探問裡，我常沒有立刻找到答案。但總在追尋答案裡的過程裡，真實的看見自己的渴望、也真實在每一個困境裡經歷被上主的幫助及帶領。上主讓我知道祂如何是一個信實的上主，也讓我感受到祂如何陪伴每一個痛苦與缺乏的時刻，也讓我經歷祂復活的力量所翻轉的舊生命、過往、舊的看見與詮釋。在生命一天天的前進裡，我經歷了又真又活的上主。

仍在神學院唸書的我，雖然處於一個無法完全出櫃、也不敢隨便主動出櫃的狀態。但因著上主的保守與力量，使我能與每一個遇見的人有真實的互動與團契——無論是學生或老師或是實習教會的會友們。我相信我們彼此因著神的愛，還有對於耶穌基督的信仰，必會保守我們在未來真相大白的時刻裡，仍能因愛擁抱、因愛有更深的合一。

來自德國的
Ivon



「聖經 的本質 就是反基要主義」一名性別 中立的上主的孩子

小時候，我很喜歡聖經，聖經裡的故事彷彿對我說話，而且也常鼓勵我。但當我意識到自己是名酷兒時，聖經似乎開始針對我。因為有段記載：上主創造男和女——兩者之間

並無別類，唯有異性戀是神所接受的。句號（按：沒有可討論的餘地）。我在對上主的愛、上主的話語和我的性別/性身份之間不停地與自己搏鬥。

當我開始讀神學時，我認識到解放神學、女性主義神學、酷兒神學和釋經。我再次愛上了聖經：它以受壓迫和被邊緣的人為中心——這肯定了上主是一位渴望所有創造物都自由與幸福的神。

不僅如此，我還發現聖經的本質就是反基要主義。通過其重重的對話式結構，聖經邀請我們把自己的經歷加添到上主的故事中，呼囑我們分享上主的使命。在理解到這一點後，我與上主便和解了。

我非常感謝能夠在一間接納LGBTIQ 教會裡工作，讓我能够與他人分享我對上主的愛和上主的話語。

來自匈牙利的 Judit



慈愛上主的 見證

我是 Judit, 今年 39 歲, 我來自布達佩斯。在我的直系親屬中, 沒有人信奉基督教。我是從外祖母那裡認識了基督教的。每逢週末, 我和姐姐都會住在外祖母家, 她會帶我們去一個改革宗傳統(加爾文主義)的教堂。在我 17 歲的堅信禮後, 我便離開了教會, 因為我覺得教會太狹窄, 與我這個年青人要探索的世界十分抽離。我也是在這個年紀, 開始愛上女孩子的。

在大學期間, 我加入了 Labrisz 女同性戀協會, 並以志願者身份組織活動。我喜歡社會運動。我雖然還是個信徒, 但我覺得沒有實踐我宗教的必要。後來我開始掛念宗教群體, 就在那時, 我找到了 Mozaik 社區, 這是一個為 LGBTQ+ 和盟友而設的普世基督教團體。

2016 年, 匈牙利 LGBTQ+ 組織 Háttér Society 開展了一個名為 LGBTQ 與基督教對話的項目。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歐洲

LGBTQ 基督教團體論壇年會, 而這對我來說, 可說是完全翻轉了我的生命。我可以將這種體驗描述為一切終於還原, 成為完整無缺了。現在的我可以說, 那份完整——或者平安——就是上主的愛, 也是讓我們在論壇團結的力量。這份完整與平安也成為了我的使命。在參加了格但斯克的論壇並聽了 Krzysztof Charamsa 的演講後, 我知道我必須在匈牙利做些事, 好讓人們體驗我在這個群體所體會到的。Charamsa 的演講禪說, 出櫃如何是一種抗議和我們抵抗教會的方式。我回應道:「我有一個呼召。」

那時, 我想成為一名牧師, 可能是匈牙利第一位出櫃的同志牧師。匈牙利的教堂還不允許有已出櫃的同志牧師或神父。我在衛斯理神學院讀神學, 該學院由匈牙利福音派團契管理的, 而這團契卻因政治原因而未被政府承認。

我還在一所教會工作, 擔任牧師助理, 並向這群體出櫃。當時教會的牧師雖然已開始走在接受同志的路程上, 但她還是未走到可接納的地步。另外, 雖然大多數會眾都很歡迎我, 但我還是會以「還在接納的路上」來形容這群體。我是第一位在會眾和神學院出櫃的人。其實, 也有一些可見的小變化: 在 2019 年基督降臨節期間, 我們與教會合作並發表了一份聲明, 其中提到了 LGBTQ+ 人士:「通過政府政策鼓吹對獨特社會群體的恐懼和異族化, 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也我們在匈牙利遇到的。我們相信, 能讓我們所有人更接近 LGBTQIA+ 群體的, 不是仇恨, 而是透過認識對方和包容。」

我目前在讀第四年神學, 而我的論文標題是「酷兒神學就是解放」(queer theology as liberation)。

JUDIT

47

來自波蘭的 Uschi



「我正在 經歷的困 難是我的雙性戀 的能見度」

我是一位來自波蘭華沙的雙性戀羅馬天主教女徒，我在同性關係裡已超過 15 年，我也活躍於教會的事奉。

我從十多歲開始，就加入了教會中的一個主要服務青年組織「光明生命運動」Light-Life Movement (Ruch Światło-Życie)，那時我從未質疑過我的異性戀身份。我是在成年並經過深思熟慮後，才開始承認自己是個雙性戀者。因此，我倖免於所有內在恐同或恐雙性戀的痛苦。除了我與教會的關係外，我完全與自己和好了。（我因父母的恐同/恐雙性戀而受了很多苦，但那是另一個故事）。由於我不是任何組織的活躍成員，我仍如常事奉；然而，因為我有與同性和異性發生性行為，我知道我沒有遵循教會的教義，所以我選擇不領聖餐。我覺得這是公平的，因為我沒有遵守規則，但同時我卻開始質疑教會關於同性戀的教義。當我越是意識到這對我來說是多麼地荒謬時，我越是想退出教會生活。

我的人生轉捩點，發生在當我被邀請當教母的時候，這對我來說也是聖靈動工的一個明顯標誌。孩子的父母堅持認為我是這個角色的最佳人選，而我覺得為了好好的把天主教介紹給我的教女兒，我需要更多地融入於教會生命中。於是我便努力調和我那穩定且纏綿繾綣的長期同性伴侶關係，和教會對婚姻觀點之間的不同。由於波蘭還未為婚姻平權，甚至連民事伴侶關係也沒有，我還先要假設我有一天可以與我伴侶結婚，而教會於婚姻的教導可適用於我的情況。我很清楚我的關係不是犯罪，所以一切也好像很就位。

然而，我真正掙扎的是我的雙性戀傾向的能見度。在思想開放的天主教徒和來自大城市的知識分子中，我可以坦然地分享我的同性關係。縱使有些人表示驚訝，但我幾乎沒有經歷過拒絕。可是，要以雙性戀身分出櫃，這對我來說仍是一個挑戰。因為是上主讓我成為同性戀的（即是，我「不適合」傳統婚姻），我知道我可以期待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的同情。可是，很少人可理解我不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仍然選擇與女人生活。這就是對於願意接納同志的天主教徒朋友來說，可能已太苛求了，或者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我幾乎沒有勇氣和毅力去嘗試找出答案。

唯一一個讓我感到絕對安全的，一個讓我可以開放和做回最真實的自己的地方，就是波蘭 LGBT + 基督徒組織，「信仰和彩虹」（Wiara i Tęcza）。在那裡，我不但可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分享我的疑慮和幫助他人，更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在一個歡迎同志和普世的氛圍中，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來自波蘭的 Ewa Hołuszko



「我必須 做出一個拯救 生命的決擇」： 跨性別與東正教

我於 1950 年出生在一個東正教家庭，這傳統及其禮儀之美一直在我心中。然而，我相信上主是絕對的，不同教派的道路都可以通向祂。

當我漸漸長大時，我發現扮演男性角色引起了我內心的怨恨，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心理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同時，我也被女性所吸引。我無法解開導致我問題的奧秘，因為在波蘭文學中，變性人這個詞在 1982 年才出現。我將我的問題託付給上主，並通過劇烈運動來解決這些問題。我成為一個虔誠的信徒，對家庭事務以及世界上的不公義都很敏感。我在外表上似乎是一個非常堅強、不容易妥協的男人。

1968 年，我開始參與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活動，當時我與其他人士共同組織了一場支持學生的學校罷工，並參加了示威遊行。後來我在技術大學開始任教，但我依然繼續我的活動。

1976 年，在一次西歐之旅中，我發現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而我內心一直存在的問題，其實與我的性別認同有關。當時我已經結婚並有個兒子。我發誓我會為了我所愛的人而活在一個我討厭的身體中，但在我內心不斷地稱呼自己為女人。只有上主是我秘密的保密者。我甚至沒有把它託付給我的告解神父。

我繼續在團結運動中反對該政權。我是其華沙分會的董事會成員。戒嚴期間（1981-83 年），當我在躲藏起來時，我在波蘭首都與其他人共同建立了最大的地下反共組織。我被拘捕後，被關進監獄並忍受了一切的審問，我也沒有洩露任何人。

在 1989 年後的新現實中，跨性別者面對的問題越趨激烈。我必須做出一個挽救生命的決定，走上轉變和變性手術的道路。手術後，我失去了之前我在科學、社會和政治領域上的成就。我從一個有名有望的人變成了一名無名小卒，處於社會的底層。在過了初步的震驚後，東正教教會允許我領受聖禮中的聖餐。雖然一些神父不接受我生命的變化，但大都會教會任命了兩位神父做為我的告解神父。

我正在慢慢恢復我在社會和政治活動中的角色。因為我於民主波蘭的服務，我獲得了一些最高的國家獎項，但同時我也經常成為騷擾和恐跨攻擊的對象。然而，我知道我終於是我自己了。

我從未失去與上主的關係。在我生命中的艱難時刻，從童年和青年時期、逃避國家安全部、在監獄迫害、在政治變革、甚至在患上癌症/腫瘤之後，是上主拯救了我。當我決定自殺時，是上主讓我活著。我相信上主，這樣我就不會害怕死亡。上主會接納我的本相。

EWA HOŁUSZKO

51

來自俄羅斯的 Yael 和 Yana Yanovich

「我們打 從一開始 就相愛了」

我們在一個獨立的非宗派 LGBT 基督教團體「世界之光」，領導聚會和音樂服事。

Yael: 我出生在一個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浸信會家庭，從小就和媽媽一起參加聚會。現在我們有時會和 Yana 和世界之光(的成員)一起參與路德教堂。我在十三歲時，便意識到自己的性取向。當我已經成為世界之光的一份子時，我在接受自己的旅程中，我開始意識到上主的律法適用於所有處於關係中的人，這包括同性伴侶和家庭。

Yana: 我出生在一個小鎮，二十歲時搬到西伯利亞生活和學習。2009 年，我在莫斯科「生命之道」靈恩教會所組織的聖經學校學習。當時我



在尋找關於我的信仰和性取向的答案。同年，我和 Yury 組織了一個 LGBT 基督教團體「世界之光」Light of the World。人們稱我為他們的領袖，但我更喜歡被稱為守護者。我相信上主愛我，但我需要時間。我想與其他 LGBT 分享這個信息。

我們的相遇

Yael: 2015 年，我找到了世界之光，一個 LGBT 基督教團體，並聯繫了該社團負責人，Yana，並開始參加他們的活動。Yana 和我從一開始就墜入了愛河了。我暗示我想結婚，但我沒有認真求婚，因為我想等她準備好。2016 年，我們互相求婚並交換戒指，並決定避免身體上一切的親密關係。我們計劃在 2017 年結婚，但(後來) 我們發現，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婚禮並加強我們的關係。我們經歷了一個猶太人的海上淨化儀式(mikvah)——為彼此淨化我們的過往人生。

Yana: 我愛 Yael 的原因繁多。她很會照顧和支持他人。我們一起祈禱。我無法想像沒有她的生活。LGBT 群體中，沒有人考慮過教會的祝福。有一天，我和 Yael 開始談論婚前的關係，並發現我們有同樣的夢境！於是，我們去了一個教堂，在那裡我們為自己祈禱，祈求上主賜福，並為我們婚前已有身體的親密而祈求饒恕。我們互稱新娘，且相信上主賜福給我們。

我們的婚禮

Yana: 我們美麗的婚禮，於 2018 年在阿姆斯特丹新教堂，Keizersgrachtkerk 舉行，並由 Wielie Elhorst 主持。為婚禮做準備的回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尤其是因為我們被迫向家人隱瞞(結婚)的時候。當兩個人立約時，婚禮就是上主的印記。通過上主，神父為這種關係蓋上了印章，而教會則充當了見證人。

Yael: 我愛 Yana。她美麗、溫柔；她心胸寬廣，對鄰居充滿憐恤。我正在學習與她一起去愛和變得更好。我們一起去教堂，分享我們的經驗，幫助彼此在靈性上成長。當上主在我們家中時，會使這種關係昇華到一個特殊的聖潔水平。

Yael 和 YANA YANOVICH

53

來自烏克蘭的 Hanna Medko



上主如何交還給我

對於不少出生於俄羅斯的人來說，接受自己（按：性向/性態）和信上主是一件具挑戰性的事情。我的父親在孤兒院中長大，與他的根和傳統完全脫節。我母親被她母親帶大，她母親是一位嚴謹和操控女仕，極盡務實和貼地。而我，就是我的時代和父母的產物。

54

來自烏克蘭的

在我上學第三年（按：約八/九歲），我的妹妹被一輛拖拉機輾過。那一天，我首次向上主呼喊，或更精準的說，我提出了一個要求：「如果祢存在的話，祢必須把她救活！」現在我明白，以她所承受的創傷來說，活著會比她從那痛楚中解脫更殘酷。

我第二個考驗在我20歲時發生。因為醫生的錯誤，我失去了我的兒子。在那個把胎兒摧毀的手術後，我被診斷為不育。之後的一年，我在痛苦和抑鬱中渡過。我的心像蓋上了一層冰的外殼。我既不能笑，也不能哭。在不眠的晚上，我會為可再次成為一個母親的機會而禱告。一年後，我到醫生那裡，他告訴我可能，或許，有一天，在手術修正後再過幾年後，或在人工受孕下，你可以生孩子。至於現在，他們說，你需要荷爾蒙，並且你永遠不會「自然地」懷孕。這個聽來像個判詞。

醫生診斷正正七天後，我發現我竟然懷孕了，試想想我的驚喜！一個月後，一位助產士確實了這個消息。那天是我一年來第一次的哭泣。是喜極而泣，並感到那層冰的外殼開始溶化了。我開始學習再展笑顏和享受每一刻。我意識到何謂每一天既是第一天，也是最後一天的經歷。我向上主求一個奇蹟，我得到了一個奇蹟。但原來上主對我另有計劃。

很多年之後的一天，我的女兒帶了一位朋友回家。那個小子介紹自己，說：「我的名字是Dima，而我是一位男同志！」

我的唯一回應是：「我是 Hanna，而你的性傾向在我來說，並沒有任何分別。」說他「感到驚訝」是一個不充分不如實的陳述。

我女兒和Dima共同租了一個公寓好一段時間，直到他們要搬走。到了此刻，他們才問我可否暫居於我家。某天晚上，Dima很晚還未歸家，我開始擔心他了，並致電給他。當夜他哭著回家並與我分享了他的故事。原來他14歲時，他要從家庭中跑逃出來。他更把離家後的事情逐一陳述。

那夜，我倆相擁而哭，哭了一整晚。到了早上，他問我可否以「媽媽」聲呼我。就這樣，上主把我曾經被醫生奪走的，完全的交還給我。

HANNA MEDKO

55

來自英國的 Christina (Tina) Beardsley 博士 牧師



復和不可被修復的？

2017 年，我被邀請擔任英格蘭聖公會的顧問，負責一個新的項目，旨在處理性、性別和人類身份有關的議題。這項目名為「生活在愛與信仰中」(LLF)，並將於 2020 年 11 月報告研究結果。

十六年前，也就是 2001 年，因為我轉為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的神父，我被教會的領導層邊緣化。四年後的 2005 年，我的主教開始接納我。現在，我和一群對 LGBTI+ 群體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們，一起參與一個國家教會的項目。該項目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復和對性和性別認同持有相互衝突信念的人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這個很有問題，因為其中一些信念，似乎是完全互不相容和不可復和的。一個相信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的基督徒，

與一個相信平等婚姻的基督徒如何和好呢？或者一位認為性別轉換是有罪的基督徒，如何與一位認為性別轉換是肯定上主賜予某人的性別認同的基督徒和好？事實上，聖公會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因這件事而分裂。

2019 年 1 月，我對試圖復和不可被復和的擔憂到達了極限，憑良心，我當時真的無法繼續下去。我進行了一次有建設性的離職面談，我就離開的初步反思被刊登在《教會時報》上。

教會作為一個機構，很少能聲稱自己是一個中立空間，可以調和不同觀點的人。它通常有條界線，一個立場。在性向方面，英格蘭聖公會不允許在教堂慶祝同性婚姻、對主持同性婚禮的神職人員進行紀律處分，並發表可能讓 LGBTI+ 人感到次一等的聲明。

當教會將就性別認同和性傾向議題上有不同神學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時，出現的就會是不平等，而不是對等。對於 LGBTI+ 人來說，這些討論不是一場思想爭辯，而是關於他們的身份和生活。這就是為什麼許多 LGBTI+ 人士，越來越不願意在社會或教會環境中參與此類對話——我們是誰，我們如何生活，不應該成為辯論的話題。

甚至在我加入 LLF 的協調小組之前，我就很清楚我應該在小組中「平衡」哪個持有對立性和性別神學的成員。然而，他們竟是在這群體中，我最容易聯繫上的人；這就是上主的方式吧。我發現我們有著相似的幽默感——也許因為他們也是某種「局外人」，儘管不是我那種——而且至今，他們仍然是朋友。縱使在加入團隊之前，和解似乎不太可能，但至少在個人層面上，和解確實發生了。賜人驚喜之神是應當稱頌的！

來自新西蘭的 Tony Franklin- Ross 牧師



「活出將 多樣性凝聚在一 起的『連字符』」 —酷兒普世主義 的個人見証

反思將多樣性凝聚在一起的「連字符」——有時處於一種可能具有創造性的張力中——也可以感覺就像雅各與天使的角力。我生活在連字符的經歷中，包括 pakeha-Kiwi（按：白人新西蘭人）、順男性酷兒、同性戀基督徒、激進東正教、被按立的門徒、牧師神學家和酷兒普世主義者。

在青年時期，我和學校朋友Nick因我們被男性吸引這狀態，被一位青年領袖輔導了。Nick在自己的信仰和性取向之間掙扎時，自殺了。我相信我是按照上主的形象被創造的，這包括了我的性取向。比起死亡這個別項選擇，這必然是更強而有力的肯定。

我在大學期間離開了教會群體，更深地認識自己作為一個同性戀者這身份，並發現了同志社群。後來，我感到上主在呼喚我重新接觸教會，且在奧克蘭社區教會(Auckland Community Church)找到了一個家。我的神學是通過那教會內 LGBTIQ 和異性戀這多元的群體中而形成的。大家都來自不同的教派。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是他們的主要信仰群體，而在於其他人來說，這是他們離開有組織的宗教活動或（重新）進入它的墊腳石。這是一個處於主流基督教邊緣的信仰群體，但信仰是他們的核心。它的成員和每週施聖餐的神職人員，也來自不同的教派。

這個經驗把我引領到衛理公會教派的按立事工，因其聖經、傳統、理性和經驗的神學框架，並因為我對普世基督教的渴望。我是第一位以出櫃男同性戀者的身分，在新西蘭奧特阿羅亞衛理公會(Methodist Church of Aotearoa-New Zealand)接受聖職培訓，也是第一位在2009年與另一位男同性戀者一起被按立的男同性戀者。在90年代，神職人員的性傾向議題曾深深地分裂了新西蘭奧特阿羅亞衛理公會。

2013年，我在釜山參加WCC大會時，偶然發現了《共同邁向生命：不斷改變環境中的使命和傳道》一刊物。該文件的核心是呼喚人們從邊緣開始他們的使命：挑戰傳統的理解，即使使命總是由有權者向無權者推行，由地球的北方向地球的南方，由直人向酷兒。

傾聽那些人們從中找到力量的邊緣群體的聲音，顯然是一項挑戰。來自LGBTIQ+邊緣的聲音多種多樣——喜悅、希望、恐懼、痛苦、傷害、生命、死亡——是通過性慾的視角看到的豐富生活體驗。這個豐富生活體驗，好比《詩篇》中同樣豐富的人類表達，是一個滙集與上主對話的珍藏。

我在酷兒邊緣的特殊經歷，肯定了酷兒普世基督教。酷兒神學是徹底的愛——一種如此極端的愛，它消除了將我們與其他人劃分的邊界、性別和性觀念固有的核板構想，甚至與上主的分隔。當一個人學會包容和承認那些生活方式與自己如何生活的願景不符合的人，並學習視大家為一個不可分割的身體而回應時，就會發現一種健全地面對他者的態度。這種經歷復合中愛的力量的彰顯，就是上主大能的釋放。

來自德國的 Maximilian Feldhake



信仰核心中的寬容和包容

我是猶太人，是位拉比，同時也是名同性戀者。我32歲，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出生和長大，2012年移民德國。現在，我在柏林生活和工作。

寬容、包容和開放是改革猶太教的核心。通過我們的運動，按立了第一位女拉比；也是透過我們的運動與重建主義運動一起的努力，創先包容了男女同性戀者和神職人員。

猶太社區的性取向問題，對我來說從來都不是問題。我家猶太教堂的長老拉比是一個自豪出櫃的女同性戀者。在我的改革猶太世界中，我從未遇到過公開對同性戀的敵意或恐同言論。對我來說——就像無數其他思想進步的猶太人一樣——性問題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有一個經常被引用關乎托拉的核心信息的塔木德故事。一個外邦人請求拉比希勒爾(Hillel)讓他歸入猶太教，條件是希勒爾要在他可以用單腳站立的時間內，把整個拖拉教導給他。希勒爾歸他入教，並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便是整個托拉，其餘的只是評論。現在去學吧。」

這個故事在只有了解了其背景後，才能明白故事的真正意義。在此之先，外邦人找拉比煞買(Shammai)讓他歸教，條件是一樣的，就是用他可以一隻腳站立的時間，把整本律法書教導給他。煞買打發了那個人，並用一個建築工人的腕尺將他推開。

可悲的是，對於我的許多宗教家同儕來說，他們對待LGBTQ猶太人的態度，仍然是根據煞買的例子，而不是希勒爾的例子。如此多的猶太人受到那些聲稱代表某種更真實和正確的猶太教的人的仇恨和蔑視，這對我來說是不可理解和不合情理的。

用愛和接受來對待LGBTQ猶太人不該有爭議——至少從我的角度來看是這樣——但現在是2021年，存在於猶太世界某些角落的恐同症真的很可怕。

作為猶太人和拉比，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保持開放，為自己 and 我的價值觀感到自豪和理直氣壯。在許多宗教社區中都存在倒退並不寬容的信仰者。我對這些人沒有時間或耐心。

我的猶太教和我作拉比的事工，全都專注於確認我們信仰的核心原則，賦予猶太人權力和加強猶太人民的凝聚力。

來自南非的 Muhsin Hendricks



南非的 穆斯林和男 同志

因與眾不同而被拒絕，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態。我不僅女性化並招到迴避，而且我也是左撇子並被逼用右手寫字和吃飯。我出生在一個保守的穆斯林家庭。我的祖父是我們社區清真寺的伊瑪目（宗教領袖）。我的母親是那裡的老師，而我的父親是靈性治療師。

我知道我和其他男孩不同。我隱藏著真實的自我，假裝與男性群體融為一體，縱使這給我帶來了無盡的痛苦。每當我被取笑時，我都會感到不被接納，而把自己推向了更深的櫃子裡。在 23 到 29 歲之間，我盡力不辜負期望。我娶了一個女人，並生了三個孩子。正是在我靈魂嚮往自由的那一刻，我鼓起勇氣離開了這段只會給我倆帶來痛苦的婚姻。然後，我在一個朋友的農場裡刻意把自己孤立起來，在一個寒冷而空蕩蕩的穀倉裡睡了三個月。我發誓要繼續禁食，直到上主給我指引，或者直到飢餓把我逼到盡頭。

有一天，在我的隱居即將結束時，關鍵時刻終於到了。我被一種知道自己是誰的感覺所震撼，我開始意識到，在我所有的孤獨中，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而我的 Hijrah（遷移）進入隱居，是我靈魂在成為自我這個旅程中的一個必要階段。我知道我越來越接近上主，而在認識上主的過程中，我越來越了解自己。我正透過我的挑戰而被塑造，以便有朝一日，我可能成為那些也在尋找那一直在尋找他們的人（按：上主）的力量支柱。

我已經做好了出櫃的準備，即使這意味著我生命可能終結。我對真實性的需求，遠大於我對生存的需求。我邀請媒體來聆聽我的故事。當它以「同性戀伊瑪目出櫃」為標題出版時，我知道它會引起軒然大波。我從清真寺的教職中被解僱，並被我的社區稱為「離群」。我經常在古蘭經中讀到包容和憐卹這些價值觀，這古蘭經和價值觀是我孤獨時的伴侶。我很高興離開了一個沒有堅持這些價值觀的伊斯蘭教。

我可能錯過了很多年的青春，但我在上主那裡得到的東西是無價的。對我來說，我的性取向和隨之而來的挑戰，就是與我與創造者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動力。

Imam Muhsin Hendricks 是南非開普敦 Al Ghurbaah 基金會的創始人。Al Ghurbaah 提供一個地方，讓因性取向、性別認同和信仰而被邊緣化的穆斯林，可以去那裡尋求心理和社會的支持。見：<https://www.al-ghurbaah.org.za/>

來自南非的 MUHSIN HENDRICKS

63

鳴謝



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壯舉已完成了。在過去的兩年半裡，很多人參與了推動Reconciliation From the Margins《邊緣和解》的出版。在2019年日內瓦的一個研討會上，我們匯集了很多構思，並成立了出版團隊。感謝Misza、Kerstin、Pearl和Martin對這項工作的協調。他們邀請了許多作者，為此出版提供了來自不同國家、宗教背景、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見證。隨後他們為這刊物所提供的十種語言找來翻譯，接著跟編輯，設計師和印刷商協調，並把印刷好的小冊子及時運送到在Karlsruhe舉行的WCC大會上。感謝Kerstin和Martin為酷兒神學撰寫的引言，並感謝WCC前任秘書長Olav Fykse Tveit主教撰寫的歡迎詞。

如果沒有本刊物中眾多志願者的無數小時辛勞，這壯舉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衷心感謝所有參與這個不可思議旅程的人。

我們希望讀者傾聽並被《邊緣和解》所感動。願您們的努力結出碩果，並祝願本刊物能觸動許多人的心靈和思緒，從Karlsruhe舉行的WCC大會，一直延伸到遠方。

Mette Basboll and Gabriele Mayer
彩虹朝聖聯盟的聯合協調員

2022年7月



邊緣和解



出版商: Rainbow Pilgrims of Faith coalition 彩虹朝聖聯盟

編輯: Kerstin Söderblom, Martin Franke-Coulbeaut,
Misza Czerniak, Pearl Wong

作者: All-in Saltillo, Ana Ester Pádua Freire 博士牧師, Arisdo Gonzalez, Chen Xiaoen, Christina (Tina) Beardsley 博士牧師, Ecclesia, Eros Shaw, Ewa Hofuszk, Fabio Meneses, Felicia, Hanna Medko, Hendrika Mayora, Ivon, Joseph Yang, Judit, June Barrett, Kasha Jacqueline Nabagesera, Maximilian Feldhake, Muhsin Hendricks, Noah Brown, Pauline, Shirley 和 Bell, Small Luk, Summer Sea, Tony Franklin-Ross 牧師, Uchenna, Uschi, Yael 和 Yana Yanovich



前言: bp Olav Fykse Tveit



引言: Kerstin Söderblom, Martin Franke-Coulbeaut

翻譯: Rym Salameh (阿拉伯文); Shirley FY Lam, Amy Phoon, Chris Weiloon Ng (中文); Michael Clifton (法文); Andreas Raschke, Axel Schwaigert, Barbara Schnoor, Carol Shepherd, Christina Holder, Christine Bandilla, Denise Kehrer, Dennis Wiedemann, Dorothee Holzapfel, Eva Kaderli, Eva Schwendimann, Franz Kaern, Henning Diesenber, Kerstin Söderblom, Manuela Tokatli, Martin Franke-Coulbeaut, Monika Bertram, Paul Holmes, Priscilla Schwendimann, Roland Weber, Stefanie Bischof, Susanne Birke, Thomas Pöschl (德文); Amadeo Udampoh (印尼文); Hyun Sun Oh (韓文); Ana Ester Pádua Freire 博士牧師 (葡萄牙文); Julie Esse (俄文); Alejandra Alonso Tak, Gabriel Nuñez Montoya (西班牙文)



文學編輯: Rima Nasrallah (阿拉伯文); Pearl Wong (中文); Jim Hodgson, Sadie Hale, Sharon Lee Ellingsen (英文); Etienne Arcq (法文); Axel Schwaigert, Kerstin Söderblom, Monika Bertram (德文); Olga Gerassimenko (俄文)

設計: Alix Chauvet, Wieke Willemsen

語言排版: Misza Czerniak

本刊物是在 ILGA-Europe、世界宣教委員會和眾多私人及機構捐助者的支持下完成的。
文件中表達的觀點不一定反映捐贈者的立場。

SUPPORTED BY
ILGA
EUROPE



© 2022